



林沅学术文集

(二)

林沅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林德安先生

林德安先生



林 沄 学 术 文 集

(二)

林 沄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沅学术文集. 2 / 林沅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3-023824-5

I. 林… II. 林… III. 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8554 号

责任编辑: 宋小军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朱光光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8 年 12 月第 一 次印刷 印张: 19 插页: 2

印数: 1—1 300 字数: 446 000

定价: 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目 录

考 古 编

戎狄非胡论	(3)
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	(7)
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	(20)
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序	(31)
查布哈渠出土羊首刀的年代问题	(37)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39)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	(77)
所谓“青铜骑马造像”的考辨	(85)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序	(88)
“商一周考古界标”平议	(94)
鲜卑族的金、铜马形牌饰	(106)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序	(110)
所谓“玉猪龙”并不是龙	(112)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序	(120)
青铜挂纆钩补说	(124)
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	(129)
关于新疆北部切尔木切克类型遗存的几个问题——从布尔津县出土的陶器说起	(143)

古 文 字 编

关于甲骨文“字素”和“字缀”的一些问题	(165)
说干、盾	(175)
先秦古文字中待探索的偏旁	(177)
“天祖丞印”封泥与“天祖蔑君”银印考	(182)
释昫	(186)
殷墟甲骨字迹研究·序	(190)
关于前辞有“贞”的无名组卜辞	(194)
究竟是“翦伐”还是“撲伐”	(209)
长子口墓不是微子墓	(213)
枣庄市东江墓地青铜器铭文部分人名的考释	(216)

花东子卜辞所见人物研究	(220)
-------------------	-------

古代史编

说“貉”	(239)
夫余史地再探讨	(249)
说“书契”	(266)
“百姓”古义新解 ——兼论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基础	(270)
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	(279)

其 他

应当加强历史考古学的人才培养与研究工作的	(289)
泽螺居中夙兴叟——忆于省吾先生二三事	(292)
主要论著	(296)

考古编

戎狄非胡论

先秦时代的戎狄，在历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诗经·长发》：“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是商人后裔在祭天大典时的颂歌中，追述其始祖契是有娥氏之女简狄所生的历史传说。或可理解为商之先世出于戎族之母。而史载周人的祖先自不窋至亶父十三世均“在戎狄之间”，直到徙居岐下后，才从戎狄中分化出来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渐居主动，走向文明，建立周朝。西周最强盛时戎狄仍颇活跃，而到西周晚年，有识之士断言：“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国语·郑语》）最后申侯联合西戎进攻丰镐，杀死幽王。平王东迁成周以避戎。但现存最早的编年史《春秋》的前半部中，仍充满了戎狄侵伐中原各诸侯国的记载。以致熟读过《左传》的刘歆说：“周自幽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应该说，当时北夷即戎狄对华夏诸国的威胁比南夷即荆蛮更大，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春秋时代从齐桓公开始的“霸业”，实质上均含有联合诸侯抗击戎狄这一重要方面。春秋后期，原本是“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的晋国，还有起于西戎之中的秦国，都开始对戎狄进攻而开拓疆土，由此而成为北方大国。而戎狄自身建立的国家，则到战国仍有存在者。

但是，在先秦史上举足轻重的戎狄，现存史籍记载甚略，以致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群集团，迄今众说纷纭，若明若暗。汉代以降，著名的《史记》把战国时尚存的戎狄和战国以前的戎狄都写进《匈奴列传》，《后汉书》又把先秦的诸戎都写进《西羌传》，都是有代表性的观点。所以近代史家中流行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戎狄和战国以后的诸胡（匈奴、东胡等）混为一谈。另一种是把西戎视为后来氐羌的前身，而其他的戎狄则视为诸胡的前身。至于其中种种具体分歧见解，实难备举。实际上，把众多的戎狄和诸胡混为一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误会，不可不加论辩。

先秦文献中记载的戎狄，在汉代有许多已消亡了，汉代学者判定他们就是汉代人实际接触到的匈奴、乌桓、鲜卑的祖先，主要是因为两者的活动地域有重合之处。而且因为战国以后北方的胡人都是游牧人，就推断先秦的戎狄也是游牧人。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一开头就写明“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所以他作《匈奴列传》，实质是为北方游牧民族立传。

北亚大草原上究竟何时开始产生专门从事游牧的人群，这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但就中国长城内外的华北地区而言，则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已可断言，并非自古以来就是游牧地区。中国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新石器时代与现今相差很大，近年研究的相同结论是，华北地区年平均温度比现今高2~3℃，1月份平均气温比现在约

高3~5℃。年降雨量约比现今多200毫米，因而亚热带北界在今渭河—汾河—桑乾河—永定河—海河一线。在西北，1990年宁夏葫芦河流域的考古和地理综合考察表明，该地区在仰韶晚期到齐家文化前期（距今5100~4200年）是稳定的高温高湿时期，农业文化遗存分布到北纬36°30'左右。同一时期，内蒙古中部的农业文化遗存则分布到包头—呼和浩特一带。而且在凉城的老虎山还发现了距今4000年以上的边长达380米×310米的石筑山城。就葫芦河流域而言，距今4200~4000年，有一个气温和降水量快速下降的阶段，而距今4000~2100年仍是气温和降水量匀速缓降的时期，到战国时期，农业北界移至北纬35°14'。在内蒙古中部，根据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不同地层的孢粉分析可知，在距今4000年左右，当地为森林草原景观，年降水量在600毫米以上。距今4000~3800年，乔木减少，变为灌丛草原景观。到距今3500年左右，耐干旱的草本植物蒿、藜为多数，木本以耐寒的松杉为主，已接近于典型的草原景观。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虽反映出养羊在畜牧业中比例增加的倾向，但仍属农牧兼营的定居遗存。而且在陕北一带的商周之际的“李家崖文化”也是有城和房屋遗迹的定居文化。在东北方，天津地区的海陆变迁综合研究表明，因气温升高、冰川融化，雨水增多而形成的全新世海浸，在距今五六千年时达到高峰，海平面比现今高出3米。当时，已有农业而定居的红山文化在现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境内遗址很多，北面延及哲里木盟。在距今约4000年时，天津地区海面已降到接近现代海面的高度，海浸的结束也是气候转向干冷的结果。但是在东北方的气候干冷化过程中，农牧兼营的定居文化也长期存在于较北的地带，昭乌达盟境内在夏商时期有发达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并有成群的城堡。西周至春秋则有夏家店上层文化，这种文化的居址中发掘出有石砌墙基的房屋、大型粮窖，家畜除牛羊外还有猪鸡。

总之，中国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广布着农业定居居民，从夏代开始的气候干冷化过程，也并未很快就使这一地区变成游牧地带。

从这样的文化地理的大背景上来考察战国以前的戎狄，可以发现，并没有记载说他们是“随畜牧而转移”的游牧人。相反，有些文献中明确记录了戎狄是有城的。如《国语·晋语一》记晋献公伐翟桓，有“郤叔虎将乘城……被羽先登”之语。《晋语九》有“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之语。所以《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晋人诱捕戎蛮子，“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与蛮子而城之”，也可以理解为这支戎原已城居。对于戎狄的经济生产方式，先秦文献中没有具体记载，《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范宣子对戎子驹支所说的“我先君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倒可以理解为姜戎是原事农耕的。被汉代以后学者作为戎狄是游牧人的唯一根据，只是《左传》襄公四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一语（《国语·晋语七》作“荐处”）。服虔、刘炫都把“荐”解释为草，故认为是指戎狄“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但杜预和韦昭都只把“荐”释为聚。按“荐”古无聚义，而有一再、频仍之义，如《诗·节南山》“天方荐瘥”，《云汉》“饥馑荐臻”。“荐居”原意当指常常变动居地，故接言“易土”。但徙居和游牧并无必然联系。商人先有八迁，后有五迁，盘庚动员国民徙居时还强调“具乃贝玉”，岂不也是“贵货易土”？因此，“荐居”只能说明戎狄还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固

定耕地，并不能证明他们是游牧人，从而轻率地把戎狄和胡混为一谈。

再从武装力量的构成来看。戎狄和胡也是不同的。胡人是骑兵，赵武灵王“胡服”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骑射”。但《左传》中两次明确提到戎狄军队主要是步兵，即隐公九年记北戎侵郑，郑伯说：“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又昭公元年记晋人和无终及群狄战于大原，魏舒说：“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从西周铜器铭文中还可以看到，一部分戎人中，也和周人一样有战车。如西周早期的小孟鼎记伐鬼方之役，“俘车卅辆”。西周中期的师同鼎记对戎作战的战果，有“俘车马五乘”之语。因此戎狄中并非只有步兵，只是战车不如华夏各国发达，仍以步兵为主。这和后来胡人全部是骑兵显然有别。战国以后成书的《管子》中，《大匡》谓齐桓公率诸侯败狄人，虘“其车甲与货”，似可理解为狄人有战车。而《小匡》则说齐桓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又把狄和胡都当做骑兵，吕思勉在《读史札记·骑射》中说《小匡》“乃战国时语，非当时实事”是很对的。

更重要的是，从人种上说战国以前的戎狄就是后来的胡的前身也是难以成立的。在中国、蒙古和俄国西伯利亚考古发掘的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匈奴、鲜卑、契丹墓，墓中出土的颅骨经鉴别均属北亚蒙古人种，其中有一部分（如我国完工墓地出土者）有北极蒙古人种的特征。这表明胡（包括东胡）在体质形态上和现代蒙古人接近，有一部分还接近于现代爱斯基摩人。然而在我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已发现的所有墓葬，墓中出土的颅骨经鉴别，绝大多数都是属于东亚蒙古人种，而且有一部分（如山西白燕的商代墓、殷墟西北岗祭祀坑中部分骨骼、凤翔南指挥西村的周人墓）还有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至于被有的学者指认为东胡前身（也有人认为是山戎）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被有的学者命名为“山戎文化”（也有人认为是白狄、无终、代）的延庆军都山墓地一类的遗存、被有些学者称之为“早期匈奴文化”遗存的凉城毛庆沟一类遗存，墓中人骨鉴别结果都是属于东亚蒙古人种的。因此实际上都不可能是匈奴、东胡的前身。迄今为止，长城沿线一带经鉴定的资料中，只有春秋之际的内蒙凉城崞县窑子墓地、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出土的人骨属北亚蒙古人种。还有内蒙东胜桃红巴拉的一具不完整的颅骨有北亚蒙古人种特征。因为人种的分化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事，已形成的人种体质特征虽可因通婚而交融，但不可能导致人群在人种归属上的根本改变。因此，无法想象在春秋时代及更早的时期广布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戎狄，会是战国以后的胡人的祖先。

因此，戎狄和华夏的区别，并非游牧人和定居农人的区别，也不是在人种上有大的不同。先秦文献中对戎狄和华夏的差别，一是强调文明修养的高下，如“夫戎狄，冒没轻儻，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国语·周语》）；“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狄无耻”（《左传》僖八年）；“戎狄无亲而贪”（《国语·晋语一》）；“夫狄……愚陋”（《国语·晋语一》）。用《礼记·檀弓》的说法来概括，就是“有直情而径行者，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另一是强调传统文化风俗之差异，即“我诸戎饮衣服不与华夏同”（《左传》襄公十四年），如“被发左衽”就是戎狄服饰的特点。至于说到语言方面，虽然《左传》襄公十四年姜戎子之语提到诸

戎与华夏“言语不达”，但此言是针对范宣子责备戎人的辩解，范宣子说：“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显然这里的“言语漏泄”是指内部知情者走漏消息。所以姜戎子才强调诸戎和华夏“贄币不通，言语不达”。即既不相往来，无从传递信息之意。并不一定是指互相听不懂说话。否则，姜戎子说了这番话后，“赋《青蝇》而退”，岂不是证明他说的“言语不达”是当面说假话了吗？

在这里还应该说明一下戎和狄两者的关系。《礼记·王制》有“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的说法，对后代学者影响很大，多把戎和狄视为平列的两个民族群体。但从先秦文献推考，实际并非如此。周人对异族称“戎”，本甚宽泛。如《尚书·费誓》“且兹淮夷、徐戎并兴”，把东方的徐人也称为戎。但多用以指北方和西方的异族，故有“北戎”（如《左传》隐公九年，又如河北元氏县所出西周早期的臣谏簋铭文中提到的邢侯所搏之“戎”，自然也在北），有“西戎”（如《诗经·车》、《国语·郑语》）。至于狄，从《左传》、《国语》等书来看，单举时和戎有别，但也有时和戎混而为一。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若使太子之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广漠，於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前称戎而后又称狄。又如：《左传》襄公四年记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请与诸戎”。同书襄公十一年追述此事则作“和戎狄”。而且，《国语·周语中》富辰曰：“狄，隗姓也。”王国维认为此隗姓之狄即殷墟甲骨文和周初小孟鼎中提到的“鬼方”，是对的。而《左传·宣公四年》述封唐叔于夏墟时，分予“怀（按即隗的同音假借字）姓九宗”，并要唐叔“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古本竹书纪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按即狄）王”。都是把隗姓之狄视为戎。由此可见，西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狄实际是包括在戎之中，只是与其他戎有别而已。

应注意的是，戎之中有“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僖公三十三年）、“姜氏之戎”（《国语·周语上》），和周人中的姜姓诸侯显然都源于商代甲骨文所见的“羌”。而且，戎中亦有姬姓。如晋献公娶于戎，重耳即是戎女“狐姬”所生。献公又伐骊戎而妻二“骊姬”（《左传》庄公二十五年）。白狄中的鲜虞也有姬姓之说（《穀梁传》昭公十二年范宁注引《世本》）。这和前文所述考古资料的体质人类学分析成果可以互相参证，且有利于推论戎狄与华夏在语言上也属于相同的语系。

直到春秋时代仍广布于现今河北、山西、陕西和河南西部等地的戎狄，有很大一部分在春秋后期开始的秦、晋等强国的开疆拓土过程中被征服而同化了。其中有一部分则一度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如代、中山，到战国时也被其他强国所灭，融入华夏之中。由于北方地区的戎狄成批消失，华夏各国才面临与草原上的游牧骑射的胡人广泛接触的新形势。大体上，从战国后期开始，中原的文人学士就把已消亡的那些戎狄想象为胡人的形象，到司马迁写《史记·匈奴列传》，把这种看法系统化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误会，至今在史学界仍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对考古资料的正确解释也造成很大的障碍。要破除这种成见，决非易事。本文只是提出几个问题，希望能引起更多同行的思索、讨论而已。

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

中国的北方系青铜器是指中国北部地区在青铜时代所使用的青铜器。

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面貌各异，在中国考古学中被分成许多考古学文化，但在青铜器方面有相当多的共同特征。它们一方面有别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另一方面又有别于中国东北地区 and 新疆地区的青铜器。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的共同性并不是单一起源的，而是不同起源的文化因素在这一自然环境相近的地带互相影响和交融的结果。无论把这一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看成是欧亚大草原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或是中国中原文化向北方的扩展，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这个地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居住，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文化传统。这个地区的青铜时代诸文化是在这种本地的文化基础上，吸收北方和南方的双向文化影响而形成的。

过去，有相当多的考古学家认为，北方系青铜器是在商代开始形成的，即开始于距今 3500 年左右，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岗文化时期^[1]。但我在 1982 年于火奴鲁鲁的商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已经指出：“我国北方地区的青铜器不仅应该和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器曾有平行发展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推到更早。……北方系青铜器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已经存在，而且对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产生了影响。”^[2]1994 年我又在一篇论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3]。后来，更多的新公布的发掘资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连田广金也已经同意我的观点，把北方系青铜器的开始年代改到夏代^[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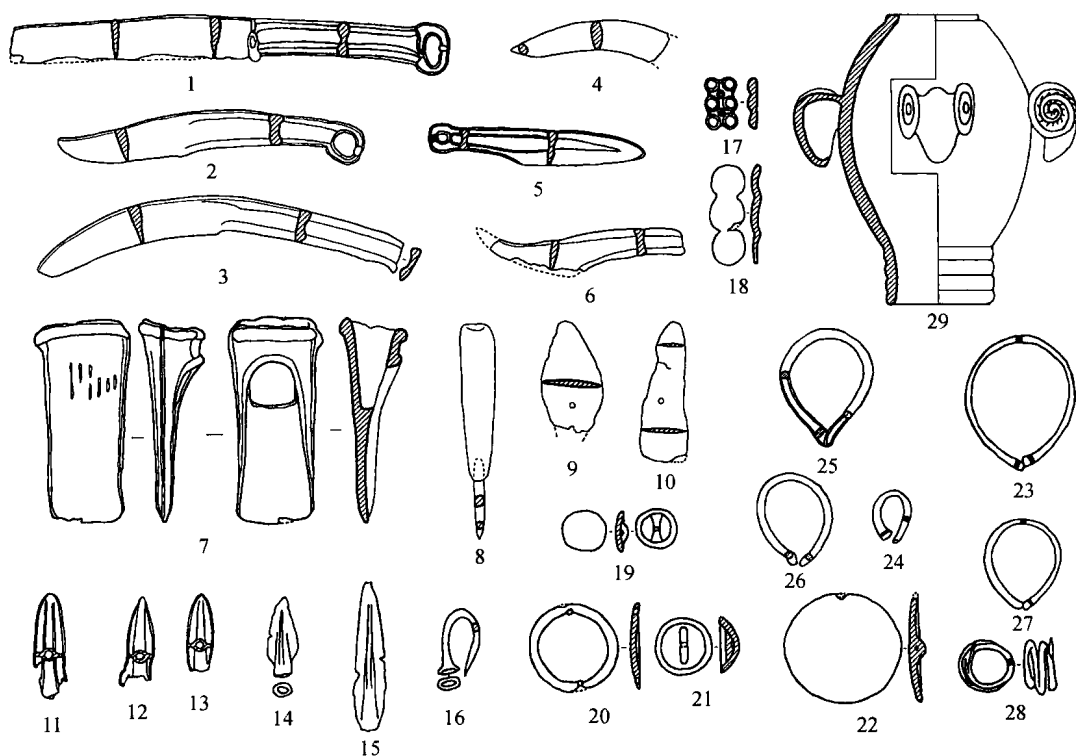
因此，本文拟就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再作一次讨论。

在北方地区的西部，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金属制品是马家窑文化的直柄青铜刀，年代距今 5000 年左右，其后的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也有红铜和青铜的器物^[5]。在北方地区的东部，也有一些证据表明距今 5000 年的红山文化可能已知铜的冶铸^[6]，但还有待更多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证实。

在相当于夏纪年的范围内（公元前 2070 ~ 前 1600 年），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分布在黄河河套及其东、北部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分布在河北北部的大坨头文化都已经发现了种类不一的铜器。

四坝文化的铜器是在玉门市火烧沟、安西县鹰窝树、民乐东灰山、酒泉干骨沟等地发掘出来的，共有 270 余件。种类有刀、削、锥、镞、矛、匕首、镞、耳环、指环、手钏、扣、泡、连珠饰、铜四羊首权杖头等（图一）^[7]。而且还有可铸 2 件箭镞的石范，范面留有使用过的痕迹^[8]。火烧沟文化年代上大体和二里头文化平行。出铜器最多的火烧沟墓地的四个¹⁴C 年代数据（树轮校正）都在夏纪年范围内。

朱开沟文化的第二段至第四段年代上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其第四段的¹⁴C 年代数据属于夏代的晚期阶段。在朱开沟遗址属第三段的墓葬中发现过铜臂钏、铜环、铜指环，属第三段的居址中发现过铜凿、铜锥和铜针。在第四段的墓葬中也发现过铜指环，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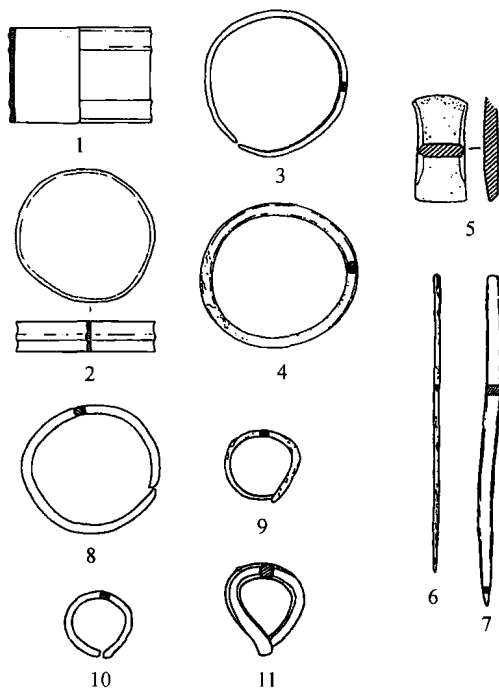
图一 四坝文化的铜器

1~6. 刀 7. 鏃 8. 锥(有骨柄) 9、10. 削 11~15. 镞 16、24~27. 耳环 17、18. 连珠形饰
19、21. 扣饰 20、22. 泡 23. 手镯 28. 指环 29. 四羊首权杖头

中发现过铜锥(图二)^[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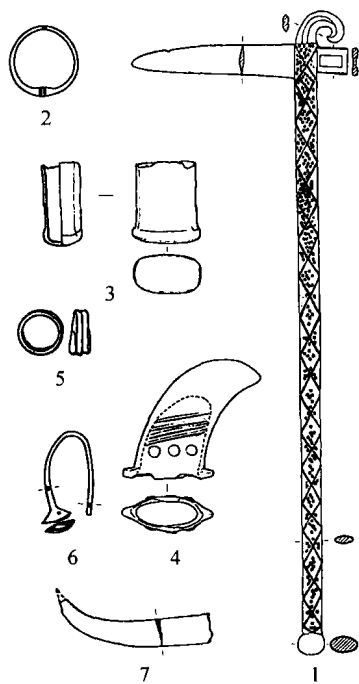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铜器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10]、辽宁兴城仙灵寺^[11]、辽宁锦县(今改称凌海市)水手营子^[12]、辽宁阜新平顶山^[13]、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14]、辽宁北票康家屯和朝阳罗锅地^[15]等遗址。种类有连柄戈、杖首、柄镞、刀子、刻刀、镞、耳环、指环等(图三)。在赤峰四分地遗址H7还出土过铸铜器用的陶范^[16]。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年代上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目前已获得20个以上的¹⁴C年代数据,也大多数在夏和商代前期纪年范围内。大山前的两把刀子和一件喇叭口耳环,水手营子的连柄戈,大甸子的杖首、柄镞、指环等铜器,从出土的层位或共存的陶器形态来看,都无疑早于商代。

大坨头文化的铜器发现于河北大厂大坨头^[17]、天津蓟县张家园^[18]、蓟县围坊^[19]、河北唐山小官庄^[20]、北京琉璃河^[21]、昌平雪山^[22]、河北蔚县三关^[23]等遗址。种类有刀、镞、耳环、指环等(图三)。大坨头文化的年代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大体同时。李伯谦认为围坊出的铜刀、耳环,张家园和三关出的耳环,都早于商代^[24]。



图二 朱开沟文化的铜器

1~4. 臂钏 5. 凿 6. 针 7. 锥 8. 环 9~11. 指环 (1~6、8、9. 朱开沟第三段 7、10、11. 朱开沟第四段)



图三 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坨头文化的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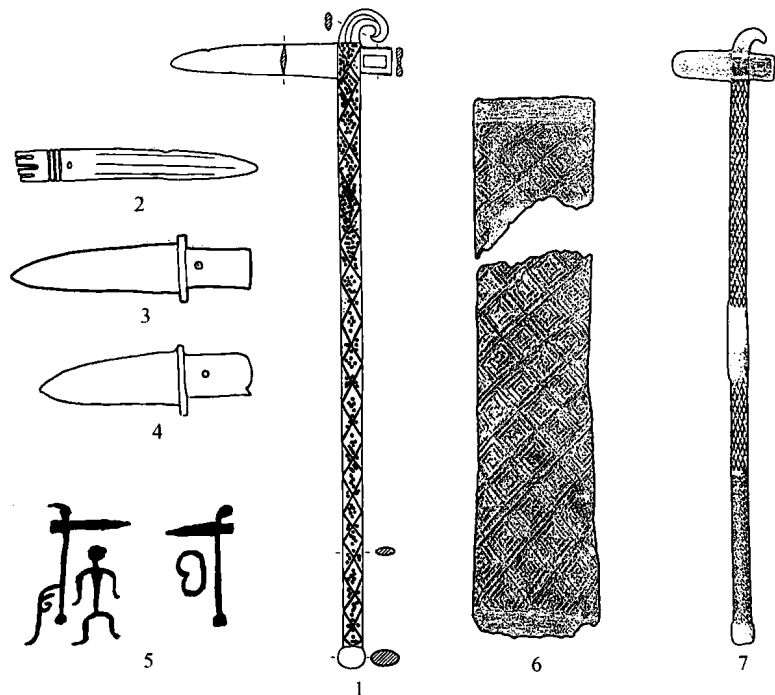
1. 连柄戈 2. 指环 3. 镞 4. 杖首
5. 指环 6. 耳环 7. 刀 (1. 锦县水手营子 2~4. 敖汉旗大甸子 5. 北京琉璃河 6、7. 蓟县围坊)

四坝文化的铜器经过检测的有红铜、砷铜、青铜之不同。总体上说，四坝文化的青铜器比齐家文化的数量增加，“不仅用于装饰品，还用作工具，特别是用作消耗性武器，并有铸范石范出土，说明青铜的生产量较大。青铜不仅有锡青铜，还有铅青铜和铅锡青铜，已开始应用复合陶范分铸法铸造器物，反映了四坝文化已属青铜时代”^[25]。朱开沟文化第四段以前的铜器发现较少，经鉴定的5件三段铜器有3件为纯铜（其中1件含1.6%砷），1件为锡青铜，1件为铅锡青铜。8件四段铜器则2件为纯铜，4件为锡青铜，2件为铅锡青铜。这也反映了青铜比例的增加。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坨头文化的铜器目前还没有进行较全面的检测。但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铜器，据报告说全为青铜质^[26]。而且已经出现了要用复合范才能制造的杖首和镞，花纹精美而用铜量甚多的连柄戈，所以中国北方地区总的来说在夏代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北方地区的青铜器影响二里头文化不再是推想，已经逐步得到实证了。比如，笔者在1982年说二里头遗址1980年Ⅲ区M2出土的环首刀^[27]是受北方来的影响，只是根据它和塞伊马—土尔宾诺文化的刀子相似，而和中原传统的刀子不同，从而作出的推论。现在就可以用四坝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实际出土的环首刀来作证了。

下面谈谈夏代的北方系青铜器所受的来自南、北两方面的影响。

上文已经提到的锦县水手营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连柄铜戈(图四, 1), 它无疑是中原系铜戈影响下的产物。不过中原的戈只有戈头是青铜质的, 柄一般都是木质的。木质的柄虽很难保存下来, 但从商代铜器的图形性很强的铭文中(图四, 5), 可以见到与水手营子连柄铜戈形状完全一致的戈柄, 上端作弯钩形, 下端有圆形的镞。而且水手营子戈柄上的纹饰是菱形的格子, 这和河南罗山县天湖商周之际的墓葬中完存的漆秘柄上的菱格形纹饰相似(图四, 6)^[28], 也表明来自南方的影响。

从援部的长宽比看, 水手营子的铜戈应属二里头文化时代, 因为它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戈(图四, 2)大体相当, 早商时代的二里岗文化铜戈就较短较宽(图四, 3), 晚商殷墟文化的戈就更短宽了(图四, 4)。这表明中原地区的戈在夏代已经影响到北方地区的东部。大甸子 M43 出土一件铜杖首(图三, 4)的形式和水手营子戈的柄端一样是弯钩形的, 日本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收藏的一件连柄铜戈, 和水手营子出土的那件是同一类型的(有邻馆的那件援部大概原来有残损, 被古董商请匠师修整过, 才成为如此奇特的样子, 其上还加刻了伪造的铭文), 只是柄上的菱形格子比水手营子这件细密些(图四, 7)^[29]。可见水手营子的戈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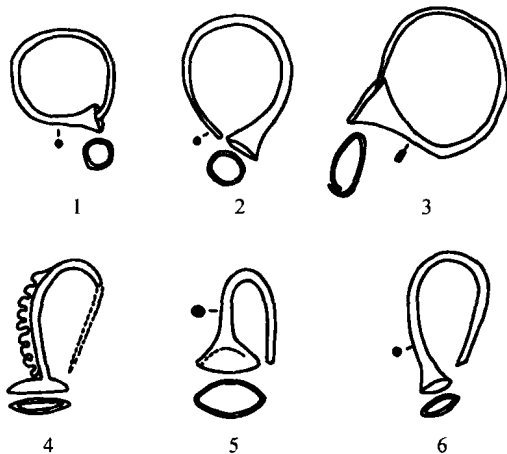
图四 戈的比较

1. 水手营子墓葬出土的戈 2. 二里头文化三期的戈 3. 二里岗文化的戈 4. 殷墟文化的戈 5. 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 6. 罗山天湖墓地出土的漆秘 7. 京都有邻馆收藏的戈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当时中国北方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最强烈的一种文化，不仅有仿照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爵、鬯，就是日用陶器如盆的演变序列都和二里头文化一致。因此在青铜器方面也明显地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中国北方地区的西部则更容易接受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影响，在夏代的北方系青铜器方面已经表现出来。

我在1992年于石家庄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中说：“夏家店下层文化（按：当时我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包括大坨头文化在内的）的耳环，一端作喇叭口形，与分布在叶尼塞河以西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铜环很奇怪地有相似性。在两个相距如此遥远的定居族团之间会发生这种交流，不正说明其间必有流动性强的人群作媒介吗？”^[30]1994年11月在汉城召开的东亚青铜器文化国际学术大会上，我宣讲《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新进展》一文时，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受到来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文化影响的一个例子^[31]。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又举出蒙古中央国立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喇叭口耳环，作为佐证（图五）^[32]。艾玛·邦克并不知道我的论文，于1998年发表的论文中也提出相似的意见（图六）^[33]。她是取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中出土的金质喇叭口耳环（图六，6），和西方的安德罗诺沃式耳环作比较，认为这种喇叭口形的耳环起源于西方，向东传布到中国的北方地区。她选的比较标本范围较广，最西面的出于咸海地区阿姆河旁（图六，1）^[34]，最北的是托木斯克附近出土的（图六，3）^[35]，最东南的是阿尔泰地区出土的（图六，5）^[36]。艾玛·邦克选阿尔泰的那件可能还因为它是包金箔的，而阿瓦涅索娃早已指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这种耳环除铜的之外，既有金质的，也有包金箔的^[37]。平谷刘家河墓葬出土的金质喇叭口耳环，据同墓随葬的商式青铜礼器应属殷墟早期，即商代中期了。其实在大



图五 喇叭口耳环的比较

1~3. 安德罗诺沃文化（自左至右：黑湖 I M76、洛夫卡 II M3、姆米纳巴德 M3）

4. 蒙古中央博物馆藏品 5. 唐山小官庄 6. 阜新平顶山